

何为可能生活：现代鲁滨逊们的伦理选择

On Possible Lives: The Ethical Choices of Modern Crusoes

任海燕 (Ren Haiyan)

内容摘要：《鲁滨逊漂流记》开辟了一块生活试验场，面对荒岛赋予的近似绝对自由的选择权，鲁滨逊故事从伦理角度抛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伦理选择如何塑造生活？后世作家的重写从不同维度回应了这个问题。图尼埃的鲁滨孙选择从过去和未来两个时间向度、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围绕好的生活，展开了乌有史实验；库切将鲁滨逊抽象化为权力的化身，以寓言笔法，建构了善遭到权力侵蚀的世界；而沃尔科特则提出了艺术－幸福生活的模型。这些来自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重写，在跨区域的空间里呈现了存在的多逻辑结构，从伦理选择的视角，为探索生活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鲁滨逊·克鲁索；米歇尔·图尼埃；J. M. 库切；德瑞克·沃尔科特；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任海燕，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旅行文学、世界的文学、亚历山大·冯·洪堡等方面研究。

Title: On Possible Lives: The Ethical Choices of Modern Crusoes

Abstract: *Robinson Crusoe* opens up a testing ground for life. In the face of the near-absolute freedom of choice granted by the desert island, Robinson's story rais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from an ethical perspective: How do ethical choices influence life? Modern re-visions respond to this ques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or instance, Michel Tournier wrote a Uranian story to explore the theme from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J. M. Coetzee, considering Robinson as an abstract embodiment of power, constructs an allegorical world where power erodes goodness. Derek Walcott provides an art-happiness model for life. These re-visions, conceiv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constitute a multi-logical structure in a TransAreal space that sheds significant insights on possible lives.

Keywords: Robinson Crusoe; Michel Tournier; J. M. Coetzee; Derek Walcott; ethical choice

Author: Ren Haiy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8, China). Her current fields of interest include travel writing,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 a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udies (Email: haiyren@hunnu.edu.cn).

1719年《鲁滨逊漂流记》面世时，没有人能够预见，这部作品将成为文学传播史上的现象级事件，更鲜有人能料到，主人公鲁滨逊会成为代表着启蒙精神的现代神话¹，有如“巨石阵”（伍尔夫 1），获得不朽。早在荷马时代，世外海岛就是文学叙事中的常见元素，但鲁滨逊的岛却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海岛，其价值在于入世性，在于与现代文明看似隔绝实则紧密的关联，由是，它成为了生活的试验场。面对荒岛场景赋予的近似绝对自由的选择权，面对生活的无数种可能，鲁滨逊故事从伦理的角度抛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伦理选择如何塑造生活？笛福的鲁滨逊受海外殖民诱惑，成功开辟新的殖民地，将其打造为彼时的资本主义乌托邦。当鲁滨逊以胜利者姿态回归家园时，他顺理成章地成为18世纪大航海时代背景下“好的生活”的典范。

如果说鲁滨逊在追求“好的生活”的过程中展现的精明、算计、冷漠，甚至于禁欲，无不烙印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伦理，其后的众多重写都在尝试重新诠释或者创造新的伦理场域，“通过[主人公的]自我选择完成人生的伦理选择，”（聂珍钊 王松林 9）以此来探索人性和存在。法国作家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Friday* 1967）、圣卢西亚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的《哑剧》（*Pantomime* 1978）和南非裔澳大利亚籍作家J. M. 库切（J. M. Coetzee）的《福》（*福* 1986），就是这种尝试的代表。尽管均诞生于20世纪下半叶，成书时期相近，但作者分散于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这使得三部重写构建起一个超地域（TransArea）的网络，展示出在这个多种逻辑并存的多样化世界里，现代生活的多种可能。

一、《礼拜五》：时间的游戏

《礼拜五》的故事保留了笛福原作的核心情节，即海岛和礼拜五的出现，并利用礼拜五无意间引发的一场爆炸，将故事分为复制和融入这两个泾渭分明的时期。在第一时期，鲁滨孙投入复制活动，在荒岛上体系性地构建起现代文明的景观，而在爆炸摧毁了一切人为活动的痕迹之后，他选择接纳和融入自然秩序，选择进一步再构可能生活。但《礼拜五》并非《鲁滨逊漂流记》的升级版。小说结尾处，鲁滨孙选择拒绝跟随“白鸟号”返回文明世界，这将一个基于空间扩张欲望的乌托邦（utopia）故事变成了乌有史（uchronia）故事。乌托邦是托马斯·莫尔依托希腊语中表示不的 *ou* 和表示地方的 *topos* 创造的概念，强调空间性，乌有史的构成借鉴了乌托邦，由希腊语的 *ou* 和表示时间的 *khronos* 加 *ia* 构成，强调的是时间性。开辟一处无法“回归”家园的场域（巴迪欧 44），以时间命题替换空间命题，探索生活的可能性，这便是图尼埃重写《礼拜五》的价值之所在。

1 参见任海燕：“警惕启蒙的讹诈：也论现代神话鲁滨逊”，《外国文学》5（2012）：74-81，158页。

因为海难和爆炸，鲁滨孙不得不两次面对不存在人为印迹的生存环境，而他本着实现“好的生活”的目标，做出了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伦理选择。第一次，他模仿原神话英雄，殚精竭虑地试图在岛上重现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现代文明体系，建立起“景观符号胜于实物”的物质性世界（任海燕 124），这意味着，在荒岛主题赋予的无数种可能性中，鲁滨孙选择了生活在过去，生活在记忆里。

回到过去的强烈愿望，在鲁滨孙身上悖论式地体现为持敬克己和非理性欲望的结合。一方面，仿佛未曾远离人类社会，资本主义伦理和宗教成为驱动鲁滨孙积极生活的两重动力。所谓积极生活，乃是选择将自身的工具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套用马克思的说法，按照原来生活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可以度量的世界。他的生活，似乎成为了抽象数字的集合，就连山羊都按照字母和数字混合使用的方式编了诸如 B13、L24 等号码。他延续了笛福之鲁滨逊精巧计算的特点，还将工具理性式计算转变为对自身的伦理要求，成为严格自律和节俭的典型。在克己精神支撑下，鲁滨孙选择了自我异化的劳动。超乎寻常的自律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印痕，“割破的裂口，火燎烫伤的疤痕，刀伤，胼胝，种种不可磨灭的斑痕，结成硬壳的瘢痕”（图尼埃 29）。在不懈努力之下，鲁滨孙成功地复制了一个理性彰显，生产制造出大量物质财富，结构严密、法度森严的社会拟像。

按照韦伯的说法，面对资本主义这股世俗力量的强大冲击，宗教以其超验性，成为超拔心态的保证，但在鲁滨孙身上，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训导，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他赋予世俗的举动以救赎意味、以宗教的道德寓意，不仅令宗教的超验性大打折扣，还凭添了几分揶揄意味。例如，鲁滨孙秉承儿时接受的道德教诲，将富兰克林《年鉴》中的批判贫穷、浪费和举债等行为的致富箴言涂写在岛上，试图从宗教层面为生产-消费活动定性。他声称，依照《圣经》所示，生产是善行，播种和收获乃是生产，而由于岛上不存在商品和交易，消费乃是满足一己之私，不能带来财富，与“毁坏”无异（图尼埃 53），因而是道德上的恶行。遵循这一逻辑，为了扬善抑恶，必须在提高产量的同时，降低消费。但这样不仅从前提上否定了生产，还造成新的问题，即稻谷腐烂，鼠患随之而来。与此同时，鲁滨孙还琢磨着将富兰克林的“致富经”拆为 142 个字母，在每头羊身上剪出字母图形，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揣度天意。

正如只生产不消费将致使生产的意义丧失，在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里，文明社会所彰扬的人格和品质诸如勤勉自律等，其意义也发生了改变。当对于自我的道德性约束丧失了更高目的的追求，克己就成为目的本身，而这种机械性的克己，在小说中受到了白日梦的冲击。

《礼拜五》中的白日梦是现在制造过去的一种形式，其表现形式多样，尤以不受控制的幻象为多。通常说来，记忆指向过去，想象则指向虚空和非

现实，而当想象透过欲望，嫁接在鲁滨孙的记忆里时，幻象便产生了。各种白日梦，在鲁滨孙屈从于非理性的渴望，将小岛拟人化、女性化，嵌入譬喻，以建立同它的深层次联结中，达到高潮。例如，他将小岛比喻成“太阳照耀下的一个正在成熟的果实”（图尼埃 93），而自己则是包裹其中的白色果仁。或者，他将小岛幻想成母亲，自视为胎儿，时不时会通过某个窄小的通道爬入海岛内部——他所谓的子宫——并在洞穴中驻留。此时的鲁滨孙恰如斯芬克斯，在由“人性因子”转化而成的“理性意志”与生物本能之间挣扎（聂珍钊 王松林 6-7）。沉浸于过去，向后看的选择好似将脚放入不合适的脚印中，并不能带来“好的生活”，必须重新选择。

礼拜五引发的爆炸，再次赋予鲁滨孙以选择权，这一次他决定生活在未知的可能性之中，伴随着这个指向未来之决定的，是对过去的摒弃和突破。如果说选择过去，部分地是为了回避不确定性，那么选择未来，则意味着需要采取融入的策略，坦然接受不确定的生存状态。复制的前提是否定自然秩序，试图以人为秩序取而代之，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和知识导致了另一种蒙昧，人性和感受的蒙昧”（赵汀阳 8），而融入意味着重新评估这个伦理场域、重新选择伦理身份。

鲁滨孙摒弃了礼拜五的救赎者兼教导者身份，转而视后者为通往未来向度的领路人，跟随他在游戏中生活。这个重塑自我的选择，以顺应自然为根本，通过意料之外的方式，开启了挣脱时间之网的变形。小说写道，鲁滨孙借自然神性，逐步恢复人的天真本性，不仅获得了超常感知力，身体肌肉日渐丰满，行动也愈发灵便。肉体和精神层面的变化均暗示逆生长，鲁滨孙成为了超越世俗的精神性存在，借助自然的能量，成为如孩子一般天真的人，永葆青春，进入代表着至善和绝对存在的“太阳之城”。

鲁滨孙对天真的追求显露出当下日盛的“青年崇拜”的端倪（巴迪欧 20-23），图尼埃将这种追求置于古典哲学的框架体系内，使用诸如太阳神性、首尾相连的蛇、双子星等概念，表达出对不确定性的抵抗，以及对基于古典智慧的伦理秩序的向往。不过，礼拜五的无意识引导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升华，他的存在更像是在暗指太阳之城所代表的超脱线性时间观的精神性生活同样是幻象。随着礼拜五不辞而别，幻象破灭，鲁滨孙顿感时间的重压悉数回来，这不仅揭露了太阳之城的脆弱，表达出对于至善的存疑，也展现出图尼埃对《礼拜五》的乌有史性质有着清晰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论，尽管先前的生活面目全非，但“太阳之城”似乎亦非理想化的升华。

图尼埃的鲁滨孙从过去和未来两个向度、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分别探讨什么是好的生活，却得到了一个极富怀疑精神的结尾。这印证了德勒兹的判断，没有他者的世界，是一个失常的世界。小说模棱两可的结尾，凸显了他者在场的重要性，突出了伦理考量的社会关系维度，而这正是库切构思《福》的基石。

二、《福》：权力与善

在原神话中，鲁滨逊体现了理性的自足性，人的价值独立于社会关系，理性将他从偶然性或者说运气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外在的厄运最终成就了他和他的理想生活。不同于笛福笔下那个剥离了社会关系的小说世界，《福》以寓言的笔法，呈现了一个权力侵蚀、吞并一切，包括想象力的社会图景。小说以女性人物苏珊·巴顿为纽带，透过她在巴西、荒岛和英国之间旅行穿梭的经历，构建了两重岛屿：一个是同文明社会若即若离的海上荒岛，另一个是英格兰岛。这两座岛屿一个荒芜贫瘠、人迹罕至，一个是丰饶富庶的文明社会，地理空间上也相隔甚远，看起来，他们代表的价值并不兼容，但却因为苏珊·巴顿的数个伦理选择而紧密关联，成为一对异己。小说似乎意在强调，在权力面前，没有一座岛屿是孤岛。

库切借叙述易装的技巧，塑造了一个与体系中心若即若离的价值系统拷问者苏珊·巴顿，并围绕苏珊在不同场域的抉择，再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苏珊的历险始于前往巴西寻女而不得，在返回英格兰的船上遭遇叛乱，被流放至某个无名的荒岛，遇到生活在岛上的白人克鲁索（Cruso）及其黑人仆从，被割掉了舌头的星期五。库切曾借苏珊之口，讽刺鲁滨逊神话的理想化建构并指出，荒岛应该是乱石嶙峋、蚊蝇乱舞的荒凉之地（Coetzee 7）。小岛的荒暗指天地不仁，不过并不仅仅只是自然对人和人的努力漠不关心，生活于其中的人也几近无欲无求。

初来乍到的苏珊充满好奇，对着克鲁索抛出一个接一个问题，不断试探岛上的伦理底线。透过苏珊之眼，读者发现，与勤勉的神话英雄不同，克鲁索似乎奉行虚无主义，不事劳作，但求蔽体果腹，但当苏珊得知星期五被割掉了舌头，质问公正何在时，克鲁索提出，上帝必须“时醒时睡”，唯有如此，“世界才会欣欣向荣”（Coetzee 23）。克鲁索选择容忍恶，不肯放弃对于星期五的权力，并非真正的虚无主义者。尽管苏珊曾经同情甚至部分认同星期五，当听到克鲁索的说辞后，她没有丝毫犹豫，便接受了他的观点，甚至因认同感而生出对星期五的嫌恶和厌弃，其自我定位也悄然发生变化，她开始讨好权力，自视为星期五的女主人。

作为异己，海上荒岛是英格兰岛的铺垫和先声。苏珊在荒岛讨好克鲁索，回到英格兰，她选择屈从于男性作家的权威。与荒岛上的毫不迟疑不同，回到英格兰的苏珊，其伦理身份起了微妙变化，这令她在面对伦理困境时，曾带着矛盾和迟疑的复杂态度试图同权力抗争。苏珊面临的第一重困境可以称为女儿的陷阱。苏珊决意请男性作家福代笔，书写其荒岛经历，为此，她以书信形式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感，这些信件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某日，一位素未谋面与苏珊同名同姓的女孩来到她的住处，自称是她寻而未得的女儿。苏珊在英格兰举目无亲，知道她寻女和荒岛遭遇的只有读过其书信的福，凭此

可以推断，此女乃是福凭作家之笔虚构而出。没有母亲会不认识、不认自己的孩子，但这个“父生”的孩子身世来历与苏珊毫不相干（Coetzee 91），这出寻母戏码，显然是福在幕后导演，而他虚构或者说重构代际关系，乃是有恃无恐地向苏珊宣告，男性作家不仅要将其叙述据为己有，更要将她变成他笔下的故事人物。

于是，认不认领这个由男性权威“分配”的孩子，便等同于是否屈从于男性权力。但讽刺的是，在生育权问题——这个女性似乎应该拥有决定权的问题——上，起关键作用的是福。小苏珊起初现身时，福并不在场，小苏珊甚至表示不知道福的存在，此时，他透过父生人物向苏珊施加的压力有限，她还可以尝试将其弃于林中，态度坚定地选择拒绝男性权力的侵吞。小苏珊再次出现，是在福的藏身地，彼时苏珊与福已经见面，并就故事讲述问题唇枪舌剑了一番，而福未能说服苏珊。于是，小苏珊成为福强势昭示男性创作力，表达权力立场和态度的工具。她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后一根稻草，令苏珊自我怀疑，认为尽管自己有能力运笔，却无法如福一般用文字在虚实之间创造一个世界，甚至，书写非但不能成为抗争手段，反令其丧失自我：当她写下自己的故事示人，便陷入任人摆布的境地，剩下的只有对于自身主体性的疑惑。福的笔墨虚构，在象征意义上剥夺了苏珊子宫的生育权。苏珊违背意愿认领小苏珊，这一选择虽然令人失望，却并不意外。在男性权威步步紧逼时，关键问题已经由应不应该坚持自身意愿变成能否坚持以及如何坚持。

从时间线来看，接纳父生的小苏珊，同苏珊拱手让出叙述权，放弃捍卫星期五的权利是同步的。当然，从认同星期五到站到星期五的对立面，做出这个转变的选择，其困难程度远大于对小苏珊态度的变化，因而抉择过程充满了踟蹰、犹豫甚至抗拒。苏珊回到英国后，以克鲁索的遗孀自居，俨然全权拥有了全权处置星期五的权力。在这重背景下，她将星期五与自身捆绑，部分地视其为自己的外化，给他贴上诸如孩子、影子等标签。由是，捍卫星期五的叙述权，在苏珊看来就等同于捍卫自身权力，她立场鲜明，有理有据地质问社会的不公以及对于星期五 / 苏珊欲望的无视，讨要叙述的权力。但在福的设计之下，苏珊意识到，被割掉舌头的星期五代表着一套全然不同的话语符号体系，既拒绝基于语音中心的再现，也拒绝被书写，这意味着，长久以来，她关于星期五的建构只是一厢情愿。

幻灭令苏珊放弃了对于星期五的认同。福从权力拥有者的立场，顺势抛出同克鲁索无二的“理性”说辞，唤起苏珊内心潜藏的权力欲望，滋长其对于既定权力结构的向往。在福的指点下，苏珊完成了从同情星期五到甩掉心理包袱，毫无愧疚地加入权力中心一方，从拷问权力中心到一同作恶的转变。“伦理选择行动就是自我选择的行动……通过自己的选择进行自我身份确认”（何卫华 聂珍钊 7）。苏珊的转变反应出自我身份确认的变化，是人性之脆弱的表现，它削弱了先前拷问和质疑权力的力度，将注意力从权力问题转移

到伦理问题上，提出了何为善的命题：在理性指导下做出的选择是最大的善吗？

小说开放式的结尾暗示，《福》讲述的是《鲁滨逊漂流记》的成书史，最后荒岛故事成为了福 / 克鲁索的故事，星期五从苏珊的影子变成克鲁索的影子，而苏珊则消失在荒岛故事里，同其女儿一道，变成福 / 笛福笔下另外的故事。在男性叙述权力面前，苏珊并未真正拥有选择权，她的抗争——无论是言语或是文字形式——均以失败告终，而她的每个选择，都已然成为或者即将成为某个故事的素材。

小说的结局契合了《福》的基本价值预设：善之脆弱。苏珊寻女，一路追寻正义，但她体验到并最终实践的却与之背道而驰。在这个基于权力的选择、对立和诡辩的故事里，身体和性别都是工具性的，鲜有关爱、友谊，尊严更是无从谈起。无论是星期五被阉割、苏珊在肉体和精神层面遭受的屈辱、克鲁索的离世、还是拥有叙述权力的福似丧家之犬般东躲西藏，没有人可以有尊严地活着。在《福》建构的这个权力等级分明、尊严不在考量范畴的世界里，善甚至变得无关紧要。不过，尽管小说的结尾充满讽刺，但库切还是选择留下一丝微弱的希望，依稀存在于物质性的身体中，存在于如星期五那般打上了过往烙印，拒绝被再现、唯一一具生机尚存的躯体中。

三、《哑剧》：幸福与艺术

如果说《福》从权力角度探讨普遍意义的善，关注与公共幸福相关的伦理选择问题，来自加勒比海的诺贝尔奖得主德瑞克·沃尔科特则借剧本《哑剧》抛出了围绕个体幸福的选择问题。这个版本的重写沿袭了鲁滨逊神话中的个人主义精髓，将其移植至加速全球化进程中的加勒比海地区，通过再现来自英国的哈里与当地仆役杰克逊在观念和认知上的分歧、冲突和和解，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中、阅历迥异的个体，如何通过选择善的手段，令自我变得圆满，从而实现幸福。

英国和多巴哥、哈里和杰克逊，沃尔科特似乎在原神话的框架内，构建起符合读者期待的二元对立。但是，尽管二人的出走都意味着否定——或者至少是挑战——生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追求幸福，与鲁滨逊不同，哈里的出走并非受扩张野心的驱动，跟权力的关系也不明显。从性质论，他离开英国代表的旧世界前往多巴哥代表的新世界定居，是在生活的连续性遭到破坏之后，刻意回避生活的脆弱和复杂性的举动，既是逃避，也是寻求自我和解和自我实现的博弈。一直以来，哈里努力做一个好人，做正确的事，追求幸福生活，但无常的命运——酒驾引发的车祸导致儿子早夭——摧毁了表面上看起来幸福的家庭。在诸如失望、愤怒等直接动机支配下，哈里选择以异域为改变的契机，移居多巴哥，意图通过这场自我放逐获得鲁滨逊式的全新开始。沃尔科特对于原神话的这一改动，赋予了异域冒险以新的内涵，同时

也让人重新审视幸福问题。

鲁滨逊的冒险经历脱胎于大航海时代殖民扩张的历史语境，隶属于加速全球化的第二阶段¹，它所建立的异域－幸福模型有可能为那个时代提供理想生活范式，但作为哈里的效仿对象，则只能是错位的理想。如果说十八世纪初尚能简单地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界定异域，随着加速全球化迈入第四阶段，全球性实时通讯网络的建立(Ette 24)，这两个矢量已经变得捉襟见肘，换言之，在加速全球化的时代，人与人、地域与地域之间的联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强，单纯的时间变化或是空间转换，很难对主体的感官和认知造成足够大的冲击，而与之相伴的风土差异，也未能为主体提供新的经验。由是，哈里寄希望于多巴哥与英国间的地理空间距离，通过地理空间上的位移来切断同旧世界的联结——像鲁滨逊流落荒岛一般——以寻求陌生感刺激，重获生命的鲜活感和意义，注定以失败告终。在岛上生活一段时日之后，哈里沮丧地承认，多巴哥不过是英国的“后院”(Walcott, *Remembrance and Pantomime* 135)。

后院的比喻消解了依托地理空间差距，将坏生活变成好生活的前提，也反映出哈里保守的心态、偏见和习气，于是，沃尔科特尝试加入第三个矢量，即杰克逊所代表的当地人。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杰克逊同哈里的经验、情感和想象系统均存在差异，但同哈里曾是哑剧演员相似，杰克逊也曾经从事艺术行当。沃尔科特以艺术为媒介，围绕排演鲁滨逊哑剧而起的冲突——从潜在的冲突到戏剧性冲突——做文章，利用差异同时又超越差异，不仅使异域获得异质性，更建立起艺术－幸福的新模型。

艺术为人与人平等地表达和交流“异”提供了形式和渠道。尽管沃尔科特以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取代了原神话中基于奴隶制的主仆关系，但是剧中人物依然鲜有实质性交流。哈里因为族裔的缘故，天然地继承了鲁滨逊所表征的政治身份，而杰克逊则代表着殖民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二人朝夕相处近半年，却依据传统的刻板印象进行价值判断，视对方为代表了族裔身份的面具。杰克逊常常对哈里进行绵里藏针式的冷嘲热讽，话锋直指欧洲对加勒比海殖民统治的历史，而哈里则对杰克逊的言外之意置若罔闻，只顾自说自话。因此，尽管他们都以善为手段谋求幸福生活——杰克逊也曾世界各地努力寻找幸福——二人的善却不能同频共振。甚至，两人在一段冲突中，出于戒惧心理，均捏造了耸人听闻的冲动往事，试图以想象中的恶行为掩护，建构起同想象中的对立方势均力敌的形象。

在构思哑剧情节的过程中，哈里第一次真正听到了当地人杰克逊的声音，

1 德国学者奥特玛·埃特教授将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现象冠以“加速全球化”之名，将其分为数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自发现新大陆终于18世纪英法取代伊比利亚势力，成为殖民大国，第二阶段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第三阶段始于19世纪70年代，终于20世纪头10年；第四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头20年。参见 Ottmar Ette, *TransArea: A Literary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Trans. Mark W Person. (Berlin: De Gruyter, 2016)。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标志着第四阶段结束，世界进入加速全球化的第五阶段。

体验到了异域之异，并且承认二人对于鲁滨逊故事的迥异理解源于信念的分歧。哈里来自于正在经历现代性之“狂欢”的世界（鲍德里亚 3），他曾参加过一系列狂欢式的解放运动，但却并未能从各种社会性的批评和解放里找到存在的意义，相反，情感表达成为他探寻存在之意义的途径，认知和行动都受喜、悲、失望、愤怒等情绪的影响和支配，情感依恋特征突出。相应的，他视原神话为个体经历的投射及模仿对象，把一个关于时代的宏大叙事诠释成关于妻离子散之孤独的故事，否定了这个宏大叙事背后的其他可能；而杰克逊生养于加勒比海地区，那里犹如时间胶囊，聚拢着一个杂糅多元的世界。沃尔科特曾以西班牙港为例，指出它像是成为文化符号之前的雅典，其文化多样性比乔伊斯的都柏林尤胜一筹（Walcott *Antills*），加速全球化进程对其的裹挟和同质化影响有限。因而，杰克逊高度认同鲁滨逊故事传达的终极信念，并基于对于鲁滨逊形象的认同，将原神话演绎为黑人探险者同白种野蛮人的故事，以具有冲击力的方式游戏鲁滨逊故事。

哑剧排演释放了杰克逊的创造力，他才是如鲁滨逊一般“勇敢地面对自己作为人类存在者的真实处境，不断地追求人所特有的价值的个体”（徐向东 陈玮 3），而哈里只是能力和幽默感都稍显逊色的避世者。面对命运的无常，“只有外力才可以帮我们解围”（纳斯鲍姆 2），杰克逊的创造力成为替哈里解困的外力。他敏锐地察觉到哈里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在善的动机驱使下，他在排演鲁滨逊哑剧的间隙，手持哈里前妻爱伦的照片，以之为面具，即兴反串，同哈里一起上演了一出夫妻冲突的戏码。这场戏中戏不仅为哈里的情绪提供了发泄的出口，更令他在亦真亦幻的艺术表演中，鼓起直面过往的勇气，不再逃避。由是，哈里出走多巴哥的价值得以彰显：他不再沉浸于过去生活的挫折，实现了同自己的和解，真正意义上打开了通往全新生活的大门。

从以哑剧方式对鲁滨逊经历的艺术化呈现到艺术化的模拟冲突，艺术成为联结异质性个体的有效途径，使哈里同杰克逊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平等，促成了从自说自话到对话的转变。在发生于漂流者客栈的这场争论和冲突中，哈里和杰克逊均实现了成长和改变，不仅获得了对自我的新知，还意识到荒岛问题的核心不在与世隔绝或荒芜而在信念。剧本结束之时，杰克逊做出了新的人生选择：以艺术为信仰，回归艺术人生。艺术凭借超验性直指存在的终极意义。在充分承认、探讨人性的脆弱和生活的脆弱之后，沃尔科特赞美了艺术的创造性价值和救赎性力量，确认了艺术—幸福为理想生活的模型。

四、结语

“文学从来就是人生的教科书”（聂珍钊 88）。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在对于人之信念的支撑下，扭转了无法控制的命运，将坏的生活变成好的生活，而本文探讨的这三个重写文本，回归荒岛主体预设的生活之不可控性，将笛福原作中单一的伦理身份复杂化，在社会关系中考量为了“好的生活”所做

的伦理选择。相对于鲁滨逊青年时期出海立业，返回英国之后才成家的身份设定，这三部重写的主人公无一不是有家有室之人，处于不同于鲁滨逊的人生阶段，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代表了鲁滨逊神话的成长，是历经两百余年，后人对于青年时期畅想“好的生活”的反思。从图尼埃的鲁滨孙从过去和未来两个向度、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围绕好的生活展开的乌有史实验，到库切将鲁滨逊抽象化为权力的化身，以寓言笔法建构权力侵蚀善的世界，再到沃尔科特提供的艺术－幸福生活模型，这些重写所呈现的多逻辑结构为何为正当生活提供了重要启示。

Works Cited

阿兰·巴迪欧：《何为真正生活》，蓝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Badiou, Alan. *La Vraie Vie et Je Vous Sais si Nombreux*. Trans. Jiang Lan.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19.]

让·鲍德里亚：《恶的透明性：关于诸多极端现象的随笔》，王晴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

[Baudrillard, Jean. *La Transparence du Mal*. Trans. Qing Wang. Xi'an: Northwest UP, 2019.]

Coeztee, J. M. *Foe*. New York: Penguin, 1986.

Ette, Ottmar. *TransArea: A Literary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Trans. Mark W. Person. Berlin: De Gruyter, 2016.

何卫华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族裔文学：聂珍钊教授访谈录”，《外国语文研究》1（2020）：1-12。

[He, Weihua, and Zhenzhao Ni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thnic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ie Zhenzhao.”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1 (2020): 1-12.]

玛莎·C·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 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

[Nussbaum, Martha C.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Trans. Xiangdong Xu and Meng Lu. Nanjing: Yilin P, 201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

[Nie, Zhenzhao.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

聂珍钊 王松林主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Nie, Zhenzhao and Songlin Wang, eds.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Beijing UP, 2020.]

任海燕：“礼拜五的游戏——图尼埃的主体批判”，《外国文学》（1）2019：121-129。

[Ren, Haiyan. “Play in *Friday*: Tournier’s Critique of Subject.” *Foreign Literature* (1) 2019: 121-129.]

米歇尔·图尼埃：《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Tournier, Michel. *Vendredi ou les Limbes du Pacifique*. Trans. Daoqian W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 1997.]

Walcott, Derek. *Antills: Fragments of an Epic Memo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2.

—. *Remembrance and Pantomime: Two Play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0.

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读书笔记》，黄梅 刘炳善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年。

[Woolf, Virginia. *Selected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Trans. Mei Huang, Bingshan Liu. Nanjing: Yilin P, 2016.]

徐向东 陈玮：“导读”，《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玛莎·C·纳斯鲍姆著，徐向东 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年，3-44 页。

[Xu, Xiangdong, and Wei Chen. Introduction.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by Nussbaum, Martha C. Trans. Xiangdong Xu and Meng Lu. Nanjing: Yilin P, 2018.]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第 2 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Zhao, Tingyang. *On Possible Lives*, 2nd edition.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09.]